

## 烟台故事

## 藏龙卧虎下朱潘

沙向阳

下朱潘，曾名朱潘，原与上朱潘同为一村。该村位于蓬莱城西7公里、北沟镇东北10公里处。村北临大海，三面环山，一条河沟，贯穿村中，下朱潘位于河沟东口，古称朱家沟。

相传，早在元朝年间，朱、潘二姓就到此地落户建村，开基立业，并以姓氏为名，称为朱潘村。后来村庄繁衍发展，顺着沟奔东西延伸，形成了两个自然村，偏东的位于沟奔上游，叫做上朱潘，靠西的位于沟奔下游，叫做下朱潘。朱、潘二姓，由于年代久远，历史变迁，不知何时何故消失了，但古老的村名却沿袭至今。村庄现已发展到300多户、960多人，今有李、白、高、杨、慕、于、史、丁、刘、王、张、赵、曲、姜、段、郝、孙、韩、徐、陈、成、郭等二十多个姓氏，大家和睦相处，携手共建家园。

## 一

追溯“朱潘”的古老渊源，元代著名的邱处机道长曾留下的一首古诗，意外地揭开了村庄的历史谜团：元初，朱潘二姓在此落户为村，并且在村中的山泉之侧建立道观，史称“朱潘庵”。邱处机为此庵题诗：

## 题朱潘庵

登郡西去十余里，  
大开泉石改幽居。  
山深海阔相依映，  
地僻云闲任卷舒。  
夹道清地通烟耀，  
倚天高柳挂蟾蜍。  
鸣琴坐对烟霞客，  
笑指劳生一梦虚。

邱处机这首优美的诗篇，诗情画意，字字珠玑。字里行间，显露了远古“朱潘”村的地理信息：“登郡西南十余里”“泉石”“幽居”“山深海阔”，最后一句“烟霞客”，则把邱处机与“朱潘庵”的历史渊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既反映了当时的道教之盛，又间接地印证了“朱潘”的悠久历史。邱处机选择了远离“登郡”十余里的朱潘庵修行布道，为朱潘村的历史文化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 二

下朱潘村还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根据地，村里先后涌现出一批英雄人物。

据蓬莱党史与当地村史记载：早在1938年初，朱潘村就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抗战时期，老一辈的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带领村民积极抗战。村里的热血青年踊跃参军，奔赴前线，屡立战功，曾在全国有一定知名度的高达三、白相国等，就是村里参军参战的杰出英雄

代表。

七七事变之后，蓬莱有8名热血青年奔赴延安，其中就有下朱潘村的鲁生等三人。当时，由村里光裕小学的李谊亭发展的“民先”组织成员高达三、赵一萍、王日利等积极分子，带头开展抗日救亡革命活动。1938年1月，中共蓬莱县委党组织负责人于眉来到光裕小学，与高达三等人建立了秘密党小组，后转为党支部，广泛发动群众，全力开展抗日救亡斗争。当时的下朱潘村是敌占区，村地下党支部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秘密发展了李发蒲、李瑞雪、李德长、张淑娥、杨万福、李发显、白淑珍、李瑞铭、曹占亭、刘等贤、罗秀敏等20多名党员，迅速壮大了党的队伍。英勇的共产党员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硬是把各项抗日救亡工作开展得轰轰烈烈。

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对抗斗争的需要，下朱潘村地下党支部还建立了多个抗日群众组织，涌现出农会会长白瑞香，妇救会会长白淑珍、张淑娥、罗秀敏，民兵队长白福山、高芳琦、杨万福，儿童团团长高名凯、慕芳奎、李呈祥等好干部。下朱潘村不愧是八路军的“堡垒村”，在抗日战争中，八路军的多批伤病员都秘密送到这里，在村民白淑珍、李发纯等“堡垒户”家中安心养伤。这些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照顾子弟兵，从未出现半点差错。

1945年8月15日，日寇战败投降，中华大地举国欢庆，中共蓬莱县委、县政府召开了盛大的庆祝大会。县委书记王一夫、县长孙白平主持会议，表彰了下朱潘村在抗日战争中做出的突出贡献及英勇顽强与日寇斗争的革命精神，并评其为蓬莱县抗日模范村。

1949年7月，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许世友带领大部队来到蓬莱，为解放长山列岛做准备。下朱潘村依山靠海，地理位置优越，老烟滩路从村北通过，交通方便，攻岛部队的野战医院就设在村北光裕小学，学校北边的场院也住满了战士。村里接到上级指示，迅速发动群众，全面配合野战医院开展抢救伤员等行动。儿童团配合民兵，为医院站岗放哨；妇女们来到野战医院，帮助照顾伤员、洗衣服、洗被褥。村党支部书记李发显、村长杨万福则组织村民，把做好的白面饽饽、大饼及时送到野战医院给伤员们吃，但村民们却吃着粗粮和野菜饼子。当时大家只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解放长山列岛，消灭反动派，早日解放全中国。

1949年8月11日，解放长山列岛的战斗打响了。战斗期间，不断有伤员被送到下朱潘村的部

队野战医院。下朱潘村的妇女们分为三批，不分昼夜，轮流换班，她们不怕脏不怕累，积极配合医院护理照顾伤员。8月20日，长山列岛全部解放。战后，许世友司令员还专门来到下朱潘野战医院，看望了伤员和护理伤员的群众，并留下了宝贵的合影，见证了这一难忘的历史时刻。

## 三

从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期间，下朱潘村先后有88位青年参军及从事革命工作，其中有16位青年为国捐躯。以下列举几位英雄的光辉事迹，以此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李谊亭（1882—1973），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登州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抗战初期，他积极地加入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李谊亭执教多年，言传身教，学生受其影响，思想进步，许多人都参加了革命队伍。他作为开明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参加各项革命活动，1949年当选为蓬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席、蓬莱县政协常委会副主席、县政府参议员等。

李谊亭的长子李瑞明1941年参加革命，次子李瑞荃1947年参加革命，孙女李维芳1947年参加解放军，一家三代四人先后参加了革命。

鲁生，原名李发瀛，1916年生，自幼在下朱潘村光裕小学读书，1933年8月，以优异成绩考入烟台志孚中学。1935年冬，他积极声援“一二·九”运动，翌年6月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他奔赴延安，在延安“抗大”短训班培训学习。1942年春，为粉碎敌人的大扫荡，鲁生带领一个连，隐藏在蓬东抗日根据地石皮山区一带，与敌人发生激战。他冲锋在前，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7岁。

高达三（1909—2008），曾名高成江，1936年在本村光裕小学加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2月1日参与蓬莱三军二路武装起义的组织和策划，历任三军二路政治处主任等职。1938年7月，高达三被任命为中共蓬莱县委书记。1938年9月，调任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军法处长兼后勤部政委，他随主力部队转战山东大地，与许世友将军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近年来，在党的富民政策指引下，下朱潘村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壮大了集体经济，增加了村民收入，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继续奋勇前进。

参考资料：

李福彦、高铭建提供的《百年下朱潘》村志等

## 往事如昨

## 爱劳动的女孩

珂桦

孩提时，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总是起早贪黑地忙碌着，从不知休息。天不亮，父母就起床赶去生产队劳动，漫天星辰时才收工回家。虽然整日劳作，但父母依然是快乐的，我时常听到他们一边做饭一边聊生产劳动中的趣事。父亲天生幽默，尤爱看书，他能用非常诙谐生动的方言土语，将人、事、物描述得活灵活现、令人捧腹。因此，在农闲时节，村里的那些年轻人都喜欢来我家听父亲说书、讲笑话。

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耳濡目染，爱劳动、爱生活，渗透到我的骨子里。听母亲说，我不到2岁时，就会主动拿枕头给刚生弟弟的她垫腰，会主动倒热水给她喝。那时，父母起早贪黑地忙活，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照看弟弟的活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的头上。记得有一天傍晚，我和弟弟在幼儿园里睡着了，老师一时大意，直接锁门走了。等我醒来发现天已黑、门已锁时，并未慌张，而是爬上教室的高窗，大声呼喊。好长时间后终于有人听到了，当门被打开的一瞬间，我抱着弟弟那个兴奋啊，终生难忘。

我从小就承担起了各种家务活，喂猪、捡果树枝、铲鹅屎鸭粪、洗衣服、去井里挑水……村东头的水库边或是麦田边的水渠旁，是洗衣服的好地方。我跟着几个邻居大婶大妈，端一大盆脏衣服去洗，洗完直接放在野外晒干。那些邻居大婶大妈，没少夸奖我。

上小学四年级后，我就开始给全家人做饭了。妈妈买了一台压面机，我就经常做面条儿。把土豆切细，做成面卤，再烧开水下面条。熟能生巧，我做的土豆打卤面好吃极了，到现在都是一绝。

除了家里的活儿，农田里的营生我也帮着干。我们村是种粮大村，麦田一望无边。在农活中，最累的是割麦子，最脏的是打麦场。父母舍不得让我干这种又累又脏的活儿，但我特别想干，就兴致勃勃地跟着大人到了麦田里。躬下腰刚开始割时，我心里还暗暗地定下目标，一定要割完一畦麦子，结果累得直不起腰了，还是离地头很远，最后用尽力气也没割完一畦麦子。晚上回到家，我的两只手磨出七八个透明的水泡，担心被父母看见，便偷偷地用缝衣针挑破了。第二天早晨，热情依然高涨的我，又跟着父母下了地，到了地里才知道的确没法干了，手掌磨出泡的地方，一碰镰刀把儿就钻心地疼。无奈，那天只能帮父母捆麦子了，割完麦子又帮父母往打麦场送。回家的路上，碰到好几个熟人，见了我都不理不睬的，我很是纳闷。回到家一照镜子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满脸黧黑，像个小黑人，再说别人，就连我都快认不出自己了！说来奇怪，劳动带来的成就感和喜悦感，很快就让所有的疲惫化为乌有。

上小学时，学校组织义务劳动，被称之为“颗粒归仓”。那时每年收完庄稼后，总会有一些遗漏在地里，学校就组织学生去地里捡麦穗、揽花生、揽地瓜，所有的收获都要送到学校，学校称重后会给一点报酬。每一次我交到学校的收获都是最多的，得到的报酬也是全校最多的。记得有一年，班主任老师发给我5.5元钱，对一个小学生来说，这可是一大笔钱。放学后，我兴冲冲地把钱交给妈妈，妈妈也很是惊讶，说道：“这么多钱啊！”

由于我“眼里有活儿”，不论是走亲戚还是串乡里，总能发现家里忙不过来的活计，动手帮点小忙，所以到了暑假寒假，我的几个姨妈都会争着抢着让我到他们家里住。

除了劳动，小时候我对读书学习的热爱也超过了一切。每次期末考试后或是作文得奖后，我都会把获得的铅笔、笔记本、书、奖状，像献宝一样摆在炕上，期待地看着父母疲惫的脸上绽放出笑容。有一次，父亲曾拿我“能连考全校第一”这事与民兵连长打过10块钱的“豪赌”，结果是父亲赢了。

当时，农村的孩子想要成为吃商品粮的城里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当兵提干或是随军，二是“鲤鱼跳龙门”考上中专或大学。我这个乡亲们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后来真的考上了大学。

岁月悠悠，如今我已离开故乡多年，但热爱劳动的秉性并未改变，从小目睹父母辛苦而乐观地劳动，我一直不敢忘本，内心里一直敬重那些勤劳朴实的人。